

新常態改變中國 2

全球走勢
與中國機遇

GLOBAL TRENDS
AND CHINA
OPPORTUNITIES

胡舒立 / 王爍 / 黃山 等編

希拉里 / 基辛格 / 保爾森 等口述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www.hkopenpage.com

目錄

前篇

良好的政治秩序取決於平衡 / 012

史丹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記者：胡舒立、王爍

美國篇

“沒有甚麼話題不能討論” / 024

美國第 67 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

記者：胡舒立、李昕、黃山

中美可以超越意識形態的不同 / 029

美國第 56 任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記者：胡舒立、王爍、黃山

華爾街由遠到近，中國由邊緣到中心 / 039

美國第 74 任財長、博鰲亞洲論壇理事：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

記者：胡舒立

我很高興不再站在峭壁邊緣 / 043

美國第 74 任財長、博鰲亞洲論壇理事：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

記者：胡舒立、王爍、李昕

如何與中國打交道 / 060

美國第 74 任財長、現任保爾森基金會董事長：亨利·保爾森（Henry Paulson）

駐華盛頓記者：張遠岸

金融危機的經典教訓 / 066

美國第 75 任財政部長：蒂莫西·蓋特納（Timothy F. Geithner）

記者：胡舒立、葉偉強、黃山、汪旭

特派華盛頓記者：李增新

釐清中美經貿分歧 / 078

美國第 76 任財長：雅各布·盧 (Jacob Lew)

記者：胡舒立、黃山

特派記者：唐家婕、張翹

“遏制中國與我們的目標不符” / 089

美國助理國務卿：羅素 (Daniel Russel)

記者：張遠岸

“我浸淫政治夠久了” / 095

第 43 任佛羅里達州州長：傑布·布殊 (John Ellis Jeb Bush)

記者：黃山

我站在風口浪尖 / 099

美國第 11 任駐華大使：鮑卡斯 (Max Baucus)

記者：胡舒立

我受夠了政治 / 107

美國第 10 任駐華大使：駱家輝 (Gary Locke)

記者：胡舒立

治療金融癌症的藥方？ / 114

美聯儲前主席、國際金融論壇榮譽主席：保羅·沃爾克 (Paul Volcker)

記者：王力為

對環境的真正保護來自民眾 / 128

美國環保署 (EPA) 署長：莉薩·傑克遜 (Lisa. P. Jackson)

記者：胡舒立、張瑞丹、李虎軍

病人的需求是醫療服務的核心 / 134

美國聯盟醫療體系副總裁：馬奇 (Gilbert H. Mudge)

記者：李妍、薛健聰

實習記者：俞翔

中美反腐合作行動意義有限 / 140

美國國務院負責 APEC 事務的高級官員：王曉珉 (Robert S. Wang)

特派華盛頓記者：張遠岸

中美雙邊投資協定前景 / 146

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 (PIIE) 雷吉納爾多·瓊斯

高級研究員：加利·霍夫鮑爾 (Gary Hufbauer)

記者：王力為

改革之難與歐洲之機 / 152

意大利總理：馬里奧·蒙蒂 (Mario Monti)

記者：胡舒立、李增新、張遠岸

以現代化告別過去 / 162

俄羅斯第一副總理：舒瓦洛夫 (Igor Ivanovich Shuvalov)

記者：胡舒立、黃山

結交新朋友，不忘老朋友 / 175

澳大利亞總理：阿博特 (Tony Abbott)

記者：李增新、陳沁

特派華盛頓記者：張遠岸

中國加強法治越快越好 / 181

德國駐華大使：柯慕賢 (Michael Clauss)

記者：陳沁

英國加大網絡欺凌打擊力度 / 186

英國司法大臣：福克斯 (Lord Edward Faulks)

記者：陳沁

中企在愛爾蘭面臨機遇與挑戰 / 190

愛爾蘭財長：努南 (Michael Noonan)

記者：王玲

新移民改革意欲何為 / 197

加拿大移民部長：亞歷山大 (Chris Alexander)

記者：王玲

鼓勵中國學生來新西蘭留學 / 203

新西蘭教育參贊：葛佑蘭 (Alexandra Grace)

記者：任波、趙晗

“權力裝進制度的籠子裡” / 212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Lee Hsien Loong)

記者：胡舒立

亞太經濟合作可以有多種方式 / 222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Lee Hsien Loong)

記者：胡舒立

會診中日經濟病灶 / 230

日本慶應大學經濟學教授、小泉政府內閣要員：竹中平藏 (Heizo Takenaka)

記者：胡舒立

期待亞投行建成有國際地位機構 / 243

新加坡駐華大使：羅家良 (Stanley Loh)

記者：王玲

最看好中以在農業技術領域的合作 / 247

以色列駐華大使：馬騰 (Matan Vilnai)

記者：陳沁

以色列式創新 / 250

以色列經濟部首席科學家：哈桑 (Avi Hasson)

記者：王力為

複製中國特區經驗 / 256

哥斯達黎加外貿部長：莫拉 (Alexander Mora Delgado)

記者：王玲

中智合作為拉美提供經驗 / 264

智利農業部部長：富爾切 (Carlos Furche)

記者：王玲

我們的改革並非出於短期政治利益 / 269

墨西哥駐華大使：溫立安 (Julian Ventura)

記者：王玲

重建埃及 / 273

埃及 50 人修憲委員會主席：穆薩 (Amr Moussa)

特派記者：倪偉峰

優雅前行 / 282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Christine Lagarde）
記者：胡舒立

2030 年的中國 / 290

世界銀行行長：金墉（Jim Yong Kim）
記者：胡舒立、李增新、戈揚

願與亞投行合作 / 299

亞洲開發銀行行長：中尾武彥（Takehiko Nakao）
記者：陳沁

“一帶一路”看硬件也看軟件 / 304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史蒂芬·格羅夫（Stephen Groff）
記者：王力為

中美的未來不是注定的 / 308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
記者：胡舒立、王玲
特派華盛頓記者：張遠岸

21 世紀亞洲的挑戰是保持和平 / 315

亞洲協會政策研究所所長、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Rudd）
記者：張遠岸

打破政府擔保思維是國企改革關鍵 / 321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亞洲及太平洋部主任：巴奈特（Steven Barnett）
記者：王玲

歡迎新伙伴參與非洲建設 / 325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非洲部主任：薩耶赫（Antoinette Sayeh）
記者：王力為

中國改革顯疲態 / 330

中國歐盟商會會長：伍德克（Jorg Wuttke）
記者：王玲



前 篇

良好的政治秩序取決於平衡

史丹福大學高級研究員：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

記者：胡舒立、王爍

長於宏大敘事又緊扣現實政治走向，弗朗西斯·福山必然成為各種本地思潮的國際迴音壁。

20 多年前，“冷戰”剛結束，還在蘭德公司擔任政治研究員的福山發表文章《歷史的終結》（*The End of History*），隨後擴展為專著《歷史的終結與最後的人》（*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以濃烈的黑格爾史觀，宣佈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制，擊中了“冷戰”結束後的時代精神。書成為現象級暢銷書，人成為全球首席政治寓言家。

從那以來，福山一直活躍在學術與政治交界的地帶。政治在變，而福山棄絕昨日之我，也有愛吾師更愛真理的氣勢：師從政治學一代宗師亨廷頓，但歷史終結論與亨廷頓名著《文明的衝突》（*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針鋒相對；與新保守主義旗手沃爾福威茨等交游互讚，但在小布殊政府陷入伊拉克戰爭泥沼後就果斷撰文《新保守主義之後》（*After Neo-conservatism*），與這個政治思潮陣營割席斷袍。

近來，福山更以上下兩本巨著《政治秩序的起源》（*The Origins of Political Order: From Prehuman Times to the French Revolution*）、《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Political Order and Political Decay: From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o the Globalization of Democracy*），再度震動政學兩界。在其中，福山特別地強調了政府能力（state capacity）建設，而對當下美國政府能力的判斷，充分體現於他發表在《外交》（*Foreign Affairs*）季刊上的一篇文章的標題：《衰敗中的美國》（*America in Decay: 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

怎麼回事？那個主張歷史終結於自由民主制的人，現在主張大政府

了嗎？這個問題不僅關乎福山自己，也不只是象牙塔裡的爭論，它與福山的歷次著述一樣，超出學界的範圍，撥動了現實政治的敏感神經，在另一個時代，又一次命中了時代精神，於是在太平洋的兩岸，均催動熱烈的政治討論。在美國，在中國，讀福山，大家各取所需；談福山，大家各有所圖。

然而說到底，福山自己怎麼說？在財新記者近日專訪中，他盡陳所學。

**財新
記者**

中國人第一次聽到你的名字，還是 20 世紀 90 年代初“冷戰”結束後，你宣佈歷史終結了，終結於自由民主體制。20 多年過去了，世界格局起起伏伏，你的看法變了嗎？

福山

我對基本問題的觀點不變，即隨著社會進步和現代化，歷史會朝著某一個特定的方向前進。甚麼樣的社會能夠屹立在現代化進程的終點？與 25 年前一樣，我仍認為是那些具備一定形式的自由民主和市場經濟的社會。我不認為過去這些年所發生的事情能夠真正改變這一點。

但是，過去這些年發生的許多事件，與你說的這一方向相悖。怎麼解釋？

福山

事實上，自 1970 年以來，世界上民主國家的數量從 35 個增加到了 110 個。最近八年出現了下滑，主要是在俄羅斯、土耳其等地。用股票市場作比，我們不知道這是調整——儘管短期下滑，但是長期趨勢仍是上揚——還是反轉。不過我認為，儘管美國和歐洲經歷了種種問題如金融危機，但其治理體制仍是長久而穩定的。

中國人再次聽到你的名字，是因為你近來出的一套新書，《政治秩序的起源》、《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在其中，你特別強調了政府能力（state capacity）建設。有些人因此就說，那個主張歷史終結於自由

民主體制的人，現在變成國家主義者了。這是真的嗎？

福山 不，並非如此。我說的是，良好的政治秩序取決於平衡。一方面，確實需要有強大的政府來保護社會，提供基本公共產品和服務。但是政府權力需要有法治和民主問責加以限制。沒有這些限制機制的，那是獨裁；另一方面，如果僅有民主和法治，但是政府能力很弱，也不是一個好體系。真正需要的是平衡，需要強大的政府能力、法治和民主三者並存。

記得 10 年前，你在課堂上展示了一張政府能力的簡單模型，有兩個要素，國家能力的範圍和強度。它是怎樣演變成今天這樣一個關於制度的宏大理論的？

福山 我的許多觀點是由美國這些年來的公共討論所催生的。美國人很喜歡討論政府的範圍大小，是共和黨希望的小政府，還是民主黨希望的大政府。我認為這種討論是錯誤的。政府不論大小，都可以有成功的社會。但是沒有能力的政府不會有成功的社會。因此不論大小，最重要的是政府有能力將其承諾兌現。這可能是我當年在寫《歷史終結》時沒有意識到的具有重要性的一點。

政府大小並不重要？

福山 並不是我認為不重要，我認為有些政府監管過度，對公民生活干預過多，應當有所收縮。不過，如果一國擅長於此，且民眾能夠從法律角度接受，就沒有問題，比如斯堪的納維亞半島國家，有社會民主、高福利、高稅收，民眾獲得的政府服務也好，所以他們很滿意，這些都是相對成功的社會。政府的大小並不如政府的質量重要。當然，我說的政府能力，並不是指壓迫性的能力，而是真正做

成事情的能力，比如提供教育、醫療、基建等。

你的制度三要素中談到了法治（rule of law），在你看來，法制（rule by law）與法治兩者區別在哪裡？

福山 法制僅僅是政府命令的傳達。法治，意味著政府本身及其領袖，都要和其他人一樣受到相同法律的制約。法治本身主要就是限制政府權力，總統也好首相也好不能隨意根據需要修改法律，而是一樣遵守法律。這一點，是對政府權力很重要的平衡。

那法制比人治是不是有所進步？

福山 相比當權者朝令夕改，法制當然好些，尤其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對於投資者和商人來說，如果在所有權和爭端裁決等問題上的政策不可預見，很難進行商業活動，他們不會冒這個險。

有沒有可能實現從法制轉向法治？

福山 法治意味著對權力的限制。曾有國家實現了從法制到法治的平穩過渡，比如丹麥和瑞典在 18 世紀都是專制的君主制，到了 19 世紀都過渡到憲政體系，國王自願限制了自身權力。所以確有先例。

你的制度三要素，政府能力、法治、民主問責，單獨地看，哪個與經濟增長有更強的相關性。

福山 經濟增長取決於不同國家的情況，但大體上都與政府能力和法治的某種組合相關。經濟學家們極為強調所有權保護和法治，但我還認為，還需要加上政府能夠提供強有力的非人格化的執行機制，有這

些，往往就會有強勁的經濟增長。

民主過渡總要以犧牲經濟增長為代價？

福山 不，我認為從長期看，過渡到民主體制將使整個體系更加穩定，更有合法性，對增長來說是好事。這也是為甚麼世界上許多富國都是自由民主國家的原因。國家是否穩定，並不僅僅看短期能否拉動投資和增長，而是要看合法性、民眾是否認可。這是我為甚麼認為民主重要的地方。

你說的長期指多久，100年？10年？

福山 視情況而定。現代世界中，政治意義上的時間正在加速。在歐洲和北美，許多曾經需要數百年才能形成的機制正在加速發展，因為大家都在學習。社會模式可以複製。比如日本在19世紀晚期現代化的進程很快，因為借用了西方的技術和體系。中國也從其他國家的經驗中獲益良多。

按政府能力、法治、民主問責三維度形成的矩陣中，當今世界的主要政治體，比如中國、美國、歐洲、俄羅斯、印度，分別處於甚麼位置？

福山 中國在光譜的一端，政治能力很強，法治較弱，民主問責不夠。這跟中國的歷史傳統有關。中國在2000多年前就建立了相當現代的國家制度，通過科舉考試招募公務員，按教育和能力選才。這種傳統延續至今，所以政府並不僅提供經濟增長，更有能力向民眾提供基本服務。這是很重要的成就。

印度和美國在另一端，有很強的法治、活躍的民主問責，但是政府能力相對弱一點，其中印度更弱。

歐洲國家可能更偏美國那一端，不過這些社會大都在 19 世紀由君主制演變而來，有著中央政府的傳統，所以政府更強勢一些。美國從其發展歷史來說，是一個非常獨特的民主國家。美國人不信任政治權力，所以與世界上其他民主國家相比，美國對政治權力有更多限制。俄羅斯很不幸的是根本沒有法治，其執政精英可以按照其意願修改法律，主要是人治。另一方面，俄羅斯確實有民主選舉，普京現在很受歡迎。從政府能力角度，俄羅斯實際上遠比表面看起來要弱，比中國要弱得多。俄羅斯有強大的警察和軍隊，但是男性預期壽命正在縮短，現在大約是 50 多歲，這對於工業化國家來說簡直聞所未聞。俄羅斯的醫療、教育、基建都很落後。

你在《外交》季刊上發表題為美國在衰敗的文章。為甚麼你認為美國在衰敗？

福山 我要作個澄清。我不認為美國文明在衰退。美國經濟實際上表現非常好，非常具有創新性和企業家精神，尤其是在信息技術、能源等領域。美國的問題主要在政府。我對衰敗的定義是，強有力的精英集團能夠獲取政治權力，以保護自身利益。在過去幾十年，有證據表明美國一些大的利益集團和遊說機構的權力正在上升。美國的另一個問題是兩黨政治的極端化，這鎖死了美國政府，使其在一些基本問題上都很難做出決定。

我傾向於認為，議會制比總統制要好。美國過去幾年的問題是，總統來自一個政黨，國會由另一個政黨控制，兩者不能合作。在議會制中就沒有這樣的問題。

按你說的這個邏輯，問題出在美國政治整體，而不是狹義的負責行政事務的政府。

福山 我認為問題在於政治體系。好在美國經濟生產力很高，以至於政府即便不是很高效，社會也能繼續往前走。不過這種情況不會長期持續。從美國歷史上看，當大問題出現時，美國體制都能自己解決，儘管有時會慢一點。

2016 年美國大選不遠了，希拉里·克林頓已宣佈參選，可能會出現克林頓對布殊的情況。在過去八屆總統選舉中，至少有六次選票上出現了克林頓或者布殊家族的名字。這是不是美國政治衰敗的表現？

福山 我不認為是。某個家族長期保有政治影響力的例子，到處都有，中國、日本、歐洲。在美國，出現這種情況，是選民的自願選擇，基於對一些已形成品牌的名字的偏好。克林頓和布殊這兩個名字的品牌就很有力量。我個人並不認為傑布·布殊一定就能成為共和黨候選人。這個我們等等看。

你在新書中大量寫到中國，以前則沒有。為甚麼中國突然令你這麼感興趣？

福山 很多原因。很顯然，中國崛起是個大事件，對於世界來說都是如此。中國一直都是強有力的大國，但是與全球體系的整合程度從未像現在這麼高。每個人都需要了解中國。此外，我在研究中國歷史時發現，中國作為一個文明，有很多歷史並不為外人所知。中國歷史傳統的豐富厚重本身就非常有意思。不幸的是，20 世紀以來，有很多中國人自己就丟失了與歷史的聯繫。這是很大的悲劇，有待恢復。

在中國法治和現代化進程中，中產階級將發揮怎樣的作用？

福山 中產階級有更高的訴求，他們的期望更高，包括對政府的期望。如

果他們不喜歡甚麼，一定會讓政府知道。這在一定程度上已經在中國發生了，並且將繼續成為改變中國政治的一個要素。

對於中國過去幾十年的成功，有人認為應歸功於國家資本主義，並且將之定義為中國模式。這是一個有說服力的理論嗎？

福山 中國過去做得非常好，但是舊的做法需要改變。中國不會保持過去的增長速度，經濟增速已經降到 7%，還將繼續下降。中國還沒有經歷過嚴重的倒退或者衰退。我認為除非在很大的壓力下，否則很難測試一個體系的可持續性。我並不是預計中國通不過這一測試，這還沒有發生，只是說需要在不同的情境中看中國的表現。

你怎麼看國家資本主義？

福山 我不確定國家資本主義是中國增長的秘密。中國國企的生產效率要明顯低於私營部門，可以說國企的存在更多是出於社會穩定考慮，而並非因為新的生產力和增長。中國政府將國企改革提上日程，主要因為國企效率不足。這是其狹義，廣義地講國家資本主義，相對於美國等更市場化的經濟體，中國政府對市場的干預更多。在上一次全球金融危機後，中國政府作了 4 萬億元投資來刺激經濟。這也是國家資本主義的一種，國家間接向私營市場提供了大量的資源。

中國正在進行大規模反腐敗運動，試圖建立更清廉、更有效率、更強有力的政府。你怎麼看其前景？

福山 中國政府認為腐敗在腐蝕其合法性，這種看法是對的。腐敗範圍很廣，需要打擊。反腐敗需要通過公正的司法程序來進行。從長期看，要關注的是這場運動的可持續性。我認為中國真正需要的是打

擊腐敗的機制，這意味著更獨立的司法，以及能夠將違法者繩之以法的一套司法程序。

如果腐敗已經無處不在，那在你說的這些制度建立起來之前，短期就得採取行動。腐敗就像癌症，做手術也是必須的。

福山 從政治角度看，如果大規模打擊腐敗，確實能換來支持，贏得治本時間。不過，應該建立規則和機制，明確未來哪些行為可以接受，確保人們遵守規則。

中國古代的統治者也面對腐敗問題。但是這種自上而下體制的問題在於，只能通過更多上層監督來清理發現腐敗的官員。這在信息上存在很大問題。怎麼發現誰是真正的腐敗者？這也是為甚麼我認為中國反腐敗更需要自下而上的程序，因為最了解腐敗問題的正是和腐敗官員打交道的人，應當讓這些人加入到反腐敗的過程中。中國的規則是自上而下制定的，這可以成為重要的資本，也是為甚麼中國能夠做到其他發展中國家不能做到的事情。我只是不知道從長期看這是否足夠。我認為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問責都有必要。

在你的三要素中，政府能力、法治、民主問責，哪一點現在對中國來說最重要？

福山 強有力的政府在中國已經存在了很長時間。日程上的下一項當然應當是加強法治。首先是加強法制，依照法律做出各種決定；然後，要做到人人都遵守同樣的規則，這就是法治。這對中國來說很重要，因為政府行為將更可預期。這將有助於經濟發展，消除或者減少腐敗。所有這些都與加強法治有關。

是不是這樣的一個過程，從人治，到法制，再到民主？

福山 以中國目前的情況來看，這個進程不壞。我認為應將法治改革的重要性放在政治改革之前。這也是歐洲許多國家經歷過的。在中國，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法制建設有很多，但是確實需要加強，因為中國法律體系的低效部分還很多。

實習研究員 Roma Eisenstark 整理，記者陳沁翻譯

（本文原載於《財新週刊》2015 年第 21 期）



美國篇

“沒有甚麼話題不能討論”

美國第 67 任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Hillary Clinton）

記者：胡舒立、李昕、黃山

這是財新傳媒總編輯胡舒立與美國國務卿希拉里·克林頓的首次對話。儘管只聞其聲不見其人，但當電話那端傳來早已通過電視廣播熟悉的聲音時，依然令人感覺這是一次面對面的專訪。

簡短的寒暄後，切入主題。話題從美國擊斃“基地”組織頭目拉登開始，延伸到拉登之死對中美關係的影響。此前有評論指出，“9·11 事件”讓本因南聯盟炸館事件和中美南海撞機而出現的兩國關係緊張獲得轉機，進而迎來總體合作的十年。更有分析指出，在美國忙著在整個中東抓捕拉登，給自己留下不可持續的財政赤字之際，中國專注於其勢不可擋的崛起。美國幹掉了頭號敵人，卻可能迷失了大方向。

我們甚至沒有迴避被一些觀察家視做可能阻礙中美關係大局的棘手問題，包括圍繞人權問題的爭論。對此，希拉里的回應是，中美兩國歷史、文化、價值觀迥然不同，因此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結論也不可能完全相同。這也似乎回應了中國副外長崔天凱對這一問題的表態：“中美兩國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水平不同，兩國國情有很大差別，所以在人權問題上有不同的看法，這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看來，分歧並不可怕，問題是共同尋找緩和和分歧的辦法。而無論是已有的中美人權對話，還是剛剛結束的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S&ED）上新的機制創新——有兩國軍方人員參與的戰略安全對話和中美亞太事務磋商，都可視做兩國解決爭議和歧見的嘗試。

當然，我們並不會就此天真地認為，中美這對當今世界最重要的雙邊關係，會就此步入穩定的上升期。相反，如我們反覆指出的，起起伏伏，將會是可預見的一段時期中美關係的常態。比如，對台軍售不會停止，美

艦機在中國專屬經濟區內高頻度偵察也不會消失。

但正如國務委員戴秉國在對話結束後發佈會上所言，美方重申歡迎一個強大、成功並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的中國，尊重中國的核心利益，不謀求遏制中國，無意搞亂中國。中方強調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也無意挑戰美國。

只要雙方堅持這個底線，中美關係不會壞到不可收拾。

**財新
記者**

首先祝賀美國擊斃本·拉登。在後拉登時代，美國全球戰略將會有怎樣的變化？

希拉里

首先我想說的是，美國將繼續致力於打擊恐怖主義，這一點我們在第三輪中美戰略與經濟對話中與中方有所討論。恐怖主義一定要根除，每個人都應當為反恐貢獻力量。美國很高興在這一問題上與許多國家都保持了良好的伙伴關係。

我們將幫助包括阿富汗在內的國家形成其自身的反恐力量。我們也將支持包括巴基斯坦、非洲在內的國家和地區打擊極端分子勢力。

中美關係在“9·11”事件後出現轉機，其中一部分原因是雙方擔負了反恐的共同任務。現在拉登已死，是否會引發雙邊關係中出現更多挑戰？

希拉里

我不這麼認為。將拉登繩之以法，是國際反恐事業的重要里程碑。不幸的是，仍有許多人想通過暴力手段尋求改變，或將其價值觀強加於人。因此，儘管擊斃拉登是一項重要成就，但並不意味著反恐的結束。我們將繼續與全球伙伴一起，打擊恐怖主義造成的威脅。

中美關係在合作強度上愈加緊密，但看來雙方合作的廣度有變窄的趨勢。你怎麼看？

希拉里 我認為中美關係得到了擴展和深化。我們的目標是與中國建立積極、合作、全面的雙邊關係，使雙方在意見相同或不同的領域都能夠展開公開、坦誠的對話，增進了解，加強合作。

因此，我認為目前的中美關係是非常牢固的。我們一起討論了許多問題。就在剛剛結束的中美第三輪戰略與經濟對話上，來自兩國政府官員、商界領袖、女性領袖及學者就諸多問題展開深入探討，包括清潔能源、農業生產、加強民間交流、互派學生赴對方國家學習等。

從你剛才介紹的及我們所掌握的本輪 S&ED 的情況，雙方軍界展開的戰略安全對話將如何發揮效力，就亞太地區問題的磋商又將產生怎樣作用？

希拉里 我非常高興今年我們第一次舉行戰略安全對話。雙方軍政界高層能夠坐在一張桌子上討論一些敏感複雜的問題。當然會有意見不同的情況，但是我們不希望出現誤會、誤解和誤判。那將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我們希望能夠在戰略安全問題上展開盡可能多的對話。今年我們有了一個良好的開端，我們希望能將這種勢頭保持下去。我認為雙方一致同意這種對話是有益處的。我們也非常滿意第一輪戰略安全對話取得的成果。

中美一東一西，隔洋相望，都是亞太地區的重要力量，都在該地區有重要利益及關係紐帶。我們希望能與中方探討如何增進了解，加深合作，處理爭端。這不僅對於兩國，也對該地區希望中美加強合作的各國都有益處。可以說，亞太地區的許多國家都希望中美能夠和平解決爭端，共同實現包括災難預警及應急在內的重要目標。因此我認為這是非常積極的進展。這個想法最初是由中方提出的，我們也很高興中方提出這個建議。

中美應當如何避免包括人權問題在內的一些較為棘手的問題致使雙邊關係脫軌？

希拉里 我們必須認識到，中美兩國歷史、文化、價值觀迥然不同，因此對許多問題的看法、結論也不可能完全相同。我覺得完全相同將是非常乏味的。我們需要做的就是盡可能坦誠地表達各自的觀點。沒有甚麼話題不能討論，沒有甚麼問題需要隱瞞，甚麼都可以談，這也是我們正在做的。

從美方的角度講，人權是美國的重要利益及價值觀之一。我們將繼續提出這一問題，並聆聽中方的反應。我們期待在這一領域能取得進展。同時，我們也希望雙邊關係保持強勁、穩定的勢頭，即使出現爭議，雙方合作與對話也不會受到影響。

你如何定義中美經濟關係的發展路徑？

希拉里 在中美共同努力下，兩國經濟關係取得了重要進展。我個人認為，如果沒有中美之間的合作，世界將經歷一場更為嚴重的經濟蕭條。正是中美兩國領導人採取的負責、合作的態度，使世界經濟正緩慢走出奧巴馬總統上任以來所經歷的困難時期。

因此，我認為，雙邊經濟關係得到加深與擴展。昨天，我們與兩國商界領袖共進午餐，大家就兩國經貿領域取得的進展與亟待改善的問題開誠佈公地交換了意見。我非常喜歡這種透明的討論問題的方式和他們提出的解決辦法，這是解決爭議最好的方式。

在朝鮮和伊朗問題上，中方的反應是否達到了你的預期？

希拉里 正如你可能預料到的，我們對這兩個問題展開了詳盡討論，因為這兩個問題都非常重要。中美兩國有著一個共同的目標，即都不希望

在朝鮮半島和中東地區出現核武器擴散。我非常感謝中國與美國一道，在聯合國對這兩個國家實行制裁上做出的努力，我們正在落實這些制裁。當然，工作是永遠做不完的，但我們的確取得了進展。我們特別關注與中國一起努力，防止朝鮮挑釁及發展核武器。那將是非常危險的。因此我們致力於加強與中方合作，達成這一共同的目標。

記者陳沁對此文亦有貢獻

(本文原載於《財新週刊》2011年第19期)

中美可以超越意識形態的不同

美國第 56 任國務卿：基辛格（Henry Kissinger）

記者：胡舒立、王爍、黃山

眼前的基辛格，與媒體上的形象並無二致：身材不高，雖顯老態，但衣著一絲不苟——黑西服、白襯衫外加精緻的袖扣——典型的華盛頓外交家形象。

簡單寒暄後，採訪迅速切入正題，從基辛格的新作《世界秩序》（*World Order*）開始。作為現代國際關係現實主義理論的倡導者和實踐者，基辛格浸淫外交數十年。特別是在 1969 年至 1977 年間，他先後出任共和黨尼克遜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國務卿以及繼任者福特總統的國務卿，成為整個 20 世紀 70 年代美國主要外交政策的決策者和執行者，他的現實主義理念也因此得以發揚光大。

從美蘇的緩和，到歷史性地推動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往來進而形成事實上的中美聯手抗蘇聯盟，以及旨在結束越戰的《巴黎和平協定》的簽訂，無一不留下基辛格深深的烙印。爭議也罷，褒獎也好，不可否認的是，即便在 92 歲的高齡，基辛格依然被之後的美國歷屆政府以及其他國家領導人問計，其影響力可見一斑。而從《大外交》（*Diplomacy*）《論中國》（*On China*）到最新的《世界秩序》（*World Order*）在內的 14 本著作，幾乎沒有等閒之作，也足以看出基辛格的智慧與精力。

作為“中國的老朋友”，基辛格同毛澤東以來的中國主要領導人都有過會面。專訪前一天，他剛剛獲得中國最高領導人習近平接見，並共進晚餐，足見基辛格在中國的影響力。作為當年中美恢復正常關係的操盤手，基辛格對今天的中美關係有足夠的洞見：作為當今世界最重要雙邊關係的中美關係，歷經正常化以來 40 多年的風雨，能否以及如何進入新型大國關係的建設軌道。

歷史明示，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的並行從來不會一帆風順。觀察者言，在 2013 年中美兩國最高領導人加州莊園會晤後，原本預期的兩國關係改善未見到來；相反，老問題猶在，新問題不窮，以致在美國國內關注中

美關係人士發出中美關係要進行危機管控的呼聲。而這，即便對習慣了風浪的中美關係而言，也是不尋常的聲音。

好在，中美關係“大而不倒”，重要性就在於此，往往在普遍不看好的情況下，由於兩國內部演變和雙邊互動對全球格局的影響力，使得即便各自國內“利空”因素充斥時，兩國關係往往會出人意料地糾偏。比如2014年美國總統奧巴馬訪華，一片悲觀聲中，習近平與奧巴馬攜手夜遊中南海，隨即公告兩國關於氣候變化問題的歷史性共同聲明。

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和關切實在太多，全球治理缺一不可。伊朗核危機、朝鮮問題、後美軍時代的阿富汗穩定、突竄的“伊斯蘭國”（IS）、烏克蘭危機，包括伊拉克、敘利亞和利比亞的動盪，這些國際關係的舊恙新疾，都需要中美兩國的合作。因此，即便在價值觀、社會制度層面的差異，也無法覆蓋利益驅動的中美關係。兩國的共同利益如此之大，以至於可以超越意識形態的不同。這或許也解釋了基辛格及其現實主義政治的主張迄今對兩國關係的相關性。

基辛格發言，人們在聽。

“我不認為任何國家可以憑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

◆ 記者述評 ◆

守成大國與新興國家難以避免衝突，被稱為“修昔底德陷阱”，國際衝突的重要根源。德國與英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對決，被視為最經典的案例之一。這似乎是個魔咒。在過去500多年間，發生過16次新興大國與守成大國之間的互動，其中12次以戰爭告終。那麼，作為20世紀後半葉最大事件之一的中國崛起，是否會落入同一“陷阱”？此外，中國在積極參與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國際經濟秩序之外，也開始通過領銜發起金磚國家銀行、穩定基金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致力於打造新的國際多邊金融和經濟機構。這會不會遭到美方的質疑和杯葛？就此，基辛格給出他的答案。

財新
記者

你在《世界秩序》一書中提到，中美需要從“一戰”領悟深刻教訓。你說的教訓是指甚麼？

基辛格 教訓是這個：一國可能由於短期看上去很合理的事情捲入衝突，之後忽然發現自己已陷入不知如何自拔的地步。

我覺得，如果當時各國領導人事前知道“一戰”的後果，沒人會做當初的選擇。所以，中美須謹慎，以防步入表面上合理但仍帶來緊張局勢的行動；隨著時間發展，緊張關係將難以管理。

所以說必須避免失去靈活性，那甚麼情況下可能會進入僵硬狀態呢？

基辛格 兩國都得銘記不管分歧如何，共同利益更大。所以出現問題時，中美應該通過妥協來應對，而不是施壓。要記住，對和平的需求超乎當下的緊張，中美當基於此解決問題。

在書中，你還提到，伙伴關係得成為現代大國制衡的一部分，但這兩者本身是一對矛盾。為何這種矛盾是必要的？兩國怎樣才能成功管理這對矛盾？

基辛格 中國想阻止外部的人接近其領土，為此開展了相應的防衛，這是可以理解的。鑒於中國的歷史，我特別能理解。美國不希望任何地區被一個大國主導，同樣也是可以理解的，所以這構成了大國制衡的因素。

另一方面，這一平衡中的兩個因素，即中國和美國，同樣也得尋求合作，正如氣候變化方面的協議所示。我相信，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年的訪美之行將增進中美之間更多積極的理解。這兩方面的趨勢必須相向而行。

中國除了在現有國際金融秩序中尋求更大的影響力，還發起與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並行的新型多邊金融機構。你如何看待其中的戰略意義？

基辛格 現在還不夠清晰。美國和其他國家正在與中國進行對話。一些美國人將中國的舉動理解為試圖打造現有金融體系之外的另一套體系，甚至可能最終取代前者。我會說，讓歷史定吧。目前存在對發展和資本的需求，得有一種方式，讓機構分擔責任，且在那之後我們再看。我不認為任何國家可以憑一己之力打造世界秩序，我肯定中國領導人也明白這一點。

有中國商人獲得許可，將在尼加拉瓜修建一條連接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運河。美國會將其視為一個戰略挑戰嗎？

基辛格 有很多人說，不論何時中國在非洲或拉美做了甚麼，都會損害美國利益。但是，一條連接大西洋和太平洋的運河，為甚麼會給美國造成損害？

美國和中國的關係，由兩國領導人的目標以及他們與對方打交道的能力決定。我們應該明白，中國和美國現在都是大國了，我們在全球都有所經營，在一些地方，我們將並肩合作，在另一些地方則不是。我不認為這條運河是個問題，如果中國想花錢在尼加拉瓜修建運河，而不是建海軍基地——為甚麼我要擔心呢？

你在 20 世紀 70 年代參與構建了中國、美國和蘇聯的第一個大三角。到了今天，中國、俄羅斯和美國之間是否正在上演新一輪的大三角遊戲？

基辛格 就中美俄三邊關係，我在任時，我們的理論是美國要和中蘇都保持

良好的關係，美國跟中蘇的關係要比中蘇之間的關係好，不選邊站。我們明確表達中蘇之間的和平解決方案是美國重要利益所在。中國確信，如果蘇聯攻擊中國，美國必會反對。

今天，目前局勢下，美中俄這三國之間沒有特別的戰爭威脅。俄羅斯製造了也正在經歷歐洲的一場危機，這使得它更加靠近中國。這並不損害美國的利益，我無法想像中國正式與俄羅斯結盟的情景。如果真發生了，美國也會加以應對。目前為止，絕大部分問題關乎能源供應以及其他事務，這些都不直接影響美國。

烏克蘭危機會不會導致針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冷戰？

基辛格 烏克蘭危機應該通過談判取得和平解決。一年前我給《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撰稿時是這麼想的，現在也這麼想。基本的問題是烏克蘭是否應該成為軍事聯盟(北約)的一部分，或者是否應該屬於俄羅斯的軍事勢力範圍。我的觀點一直是烏克蘭不應該屬於任何一邊，它應該是一個會場而非戰場。如果這一建議早被採納，我想和平的解決方案應該已經有了。我認為這仍然是當下應該做的，持續的衝突將損害各方利益。

“習近平身負重任”

◇ 記者述評 ◇

基辛格同毛澤東以來的中國主要領導人都有過接觸，在西方戰略家中也屬唯一。在3月17日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見面時，基辛格表示，中國正在進行著具有歷史意義的改革大業；美中關係是事關全球和平、進步與發展的重要雙邊關係。構建美中新型大國關係符合雙方利益，是著眼長遠發展的遠見之舉；相信習近平今年對美國的國事訪問將是一次歷史性訪問並預祝訪問成功。

一般而言，往往是客人被稱作“中國的老朋友”，而基辛格上來就說自己是“中國的老朋友”，可見其自信。

不可否認，今天中國面對來自國內國外的挑戰愈發棘手。所謂改革進入“深水區”，容易做的事和不太複雜的改革已然完成。無論是經濟增速的下滑，還是政府債務問題和土地問題，抑或嚴峻的環境治理議題和圍繞人口結構產生醫療、教育、養老等諸方面挑戰，都是本屆政府必須應對的。同樣，在國際上，中國漸漸舒展身軀，“韜光養晦”之說不聞久矣。這既是中國和平崛起的必然後果，也對中國新時期和平發展的形象建設帶來挑戰。

你與毛澤東以來的中國主要領導人都有親身認知。你對習近平印象如何？如何在中國外交戰略幾十年來演變的背景下評價他的外交政策？

基辛格 習近平身負重任，他正試圖改變一個擁有 13 億人的國家，改變中國多年來業已建立的模式，也正取得一些成功。在中國人口從農村進入城市、世界經濟日益複雜之際進行這個轉變。我覺得，習近平會作為一位給中國帶來重大改革的領導人被載入史冊，其中一些改革將為中國帶來歷史性巨變。

你對習近平今年 9 月訪美有何期待？

基辛格 這將是習近平首次對美國的國事訪問，時值美國國內正在準備明年的大選，所以，此次訪問對中美關係的延續很有意義。美國對華外交政策已歷經好幾任總統，目前正走向奧巴馬執政期的尾聲。我相信，對華外交將得到新政府的支持。

同時，美國人還沒有真正意義上有機會傾聽中國領導人闡釋其改革計劃以及中國的發展。我相信，習近平訪美時會描繪中國正在發生的變化的圖景，這將非常重要。

你認為中國的崛起是綫性向上還是充滿波折？

基辛格 歷史上，一國崛起總有起伏。我還記得中國 1971 年的樣子，如果有人給我看一張北京的圖片，說多年後北京就是這個樣子的，我會說絕對不可能。迄今為止，中國一直在發展，持續了這麼長時間，這是史無前例的。其間出現一些下行是可能的，不過，當我們觀察中國過去 30 年到 40 年的發展，我覺得長期趨勢是向上的，如果目前正在開展的改革得以落實，更是如此。

世界秩序在十字路口

◇ 記者述評 ◇

作為當今世界兩大主題的和平和發展，如今都遭到相當大程度的考驗。就和平而言，烏克蘭危機不止，“伊斯蘭國”坐大、發達國家內生恐怖分子威脅、伊朗核問題未結，都嚴重挑戰世界的和平，地緣政治的邏輯重新抬頭。同樣，在發展端，人類能否削減溫室氣體的排放、遏制包括伊波拉在內的流行性疾病的擴散、國家間和國家內部的貧富差距拉大，以及腐敗問題的猖獗和諸多國家結構改革動力的缺失，也令發展前景蒙上陰影。

“伊斯蘭國”在中東興起，它會改變中東的基本格局嗎？

基辛格 我們看到中東正同時經歷著三到四種革命。有對現政府的不滿，有什葉派和遜尼派間的宗教分裂，有民族之間的分歧，還有“一戰”以來國際秩序的崩潰。現在，中東國家棄國界於不顧。所有這些危機都同時發生，每一個又某種程度上起源不同。

如你所言，伊斯蘭世界正在十字路口，那下一步走向何方？

基辛格 “伊斯蘭國”（IS）代表伊斯蘭教早期的寫照，即世界由哈里發（caliph）統治，他既是宗教領袖，也是世俗領袖，世界不分邊界。它不對各伊斯蘭國家加以區分，所以這種思維認為伊斯蘭教進入阿富汗、中國、俄羅斯和美國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如果這變成伊斯蘭教的主流敘事，那世界就將進入極其困難的時期，任何擁有伊斯蘭人口的國家都無法倖免於此，直到這些人意識到其方式不可接受也無法被忍受。

“伊斯蘭國”是神權政治的象徵，如何打敗它取決於幾個因素。首先，外界國家如何應對；其次，穆斯林如何應對，因為他們直接受其影響。在中東，讓一些穆斯林國家打擊“伊斯蘭國”應該不難，但有其複雜一面，“伊斯蘭國”人員來自遜尼派，如果使用什葉派力量打敗“伊斯蘭國”，長期看，這將使衝突更加複雜。

我們理解是因為這涉及了伊朗和沙特的競爭，那正好轉到伊朗核問題。解除伊朗核武能力的美伊談判正在進行之中。你認為解決伊朗核危機的辦法是甚麼？

基辛格 尼克遜總統時期，美國和巴列維國王治下的伊朗關係友好，之前幾任美國政府期間也是。如果伊朗像一個民族國家那樣行事，認可邊界，就可以對國家秩序和平做出重大貢獻。伊朗文化獨特，它是唯一一個一開始被伊斯蘭教征服卻沒有採用阿拉伯語的國家。伊朗的問題在於謀求帝國的建立，不論是由什葉派主導的帝國，還是歷史上的波斯帝國（波斯帝國東起現在中國一些地區，橫跨整個北非）。問題在伊朗是否能像民族國家一樣行事。如果能，那麼伊朗同他國建立起良好關係幾乎是自然的。